

# 論初唐貞觀詩壇的文學理論和創作

徐 盛

## 〈目 次〉

1. 引 言
2. 貞觀史臣的以政評文
3. 南北文風結合的嘗試和宏麗文風的唱導
4. 宮廷詩的進展和有時代特色的文學
5. 折衷主義文學觀的承襲和綺靡文風與綺艷文風的交叉
6. 結 論

## 1. 引言

對於武德、貞觀時期的唐初三十年的文學，一般一直認為是齊梁浮靡之風的連續，近年來多數學者強調唐初重新建立雅音的傾向。看來似乎相反矛盾的這兩種觀點，都基于唐初複雜的文學現象，可以理解為綺靡文風中新的文學逐漸成長的過程。與前代不同的新的文風，開端于貞觀君臣從古今歷史的興亡盛衰中斟酌的有助于新王朝的統治的史書，所以這時期文學帶着頗鮮明的政治色彩。這種特定時代的文學，理論和創作之間仍然存在着一些矛盾，一方面引導着新的文學內容，另一方面制約着創作的自發性活躍。所以，我認為這時期文學的矛盾不只在理論和創作之間發生的，又在當時人共認的理論本身具有的引導性和制約性之間發生的。從理論的提出到創作實踐，貞觀君臣的文學思想，給當時文學起了很大的作用，一旦確立了政教得失為文學內容，文風的問題代之逐漸站主導討論對象。可以說，貞觀文學從政治價值到審美價值的脫變中呈顯出有時代特色的文學面貌。

---

\* 열린 사이버대 實用語文學部 專任講師

## 2. 貞觀史臣的以政評文

唐初三十年的文學所承擔的最大問題，就是清理前代文學的功過和確立以後文學的方向。唐初官修五史，把這方面的理論觀點充分闡述。其中魏徵的意見代表這時期史臣的觀點，他主編《隋書》，而且《梁書》、《陳書》、《北齊書》總論，皆出其手。

魏徵的理論要點之一，是嚴厲批判梁陳文學，《隋書·文學傳序》說：

梁自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東，啓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乎！

他把梁代的蕭綱和蕭繹，包括徐、庾，看作亡國之音的發聲者。其它五史的修撰者李百藥、姚思廉、令狐德棻也有類似的敘述。顏師古也在修史時期寫的《等慈寺碑》裏說，“賤齊梁之短篇，鄙《苦寒》之危調”<sup>1)</sup>，可見這種看法是當時的普遍認識。這裏可以注意的是文學與“雅道”聯系，由于蕭梁大同之後政治上的“雅道淪缺”，所以文學也“漸乖典則”。同樣的看法反復在于魏徵《群書治要序》裏：“近古皇王，時有撰述，并皆包括天地，牢籠萬有，競辨浮艷之詞，爭馳迂誕之說。騁末學之傳聞，飾雕虫之小技，流蕩忘返，殊途同致。雖辯詞萬物，逾失司契之源；述總百端，弥乖得一之旨。”南朝的雜家書<sup>2)</sup>的弊病不僅“競辨浮艷之詞，爭馳迂誕之說”，更根本的問題是“失司契之源，乖得一之旨。”“司契”與“得一”都出于《老子》，是聖人政治的表現。前代的大規模類書與文學總集的根本缺點乃是不追求政教的得失，沒有“上所以數德教于下，下所以達情志于上，大則經緯天地，作訓垂范，次則風謠歌頌，匡主和民”的功能。<sup>3)</sup> 確立唐朝的政治綱領、經邦緯俗之際，文學與政治緊密地結合，顯得時

1) 《全唐文》卷一四八。在《旧唐書·太宗紀》有關碑銘的記載，貞觀三年十二月太宗命為戰歿者建立寺刹，命虞世南、李百藥、褚亮、顏師古、岑文本、許敬宗、朱子奢等為之碑銘，以紀功業。

2) 梁陳類書在《隋書·經籍志》分類為子部雜家類。《群書治要》也著錄于《新唐書·藝文志》子部雜家類。

代的明顯特徵。文學以政治的角度來認識，是這開國時期极其需要的理論論點，政治支配着所有的文化現象，史臣在五史中闡術前代文學的功過，多少與朝代興亡盛衰有關，尤其梁、陳、隋三代的文學的評價。他們的“以政評文”的文學觀得到衆人的共認，進而自然延伸到“以文平政”的觀點。上述顏師古文章中批判曹操的《苦寒行》，與劉勰同一論調，從碑銘的“棄刑名之苛矯”來看，因否定曹魏刑名政治來批評當時的文學。當然，對曹魏的文學，文人之間有理論分歧。魏徵的歷史觀較高明，他與封德彝關於亂後教化的問題上討論中，反駁封德彝持“三代以後，人漸澆訛”的歷史觀，說“若言人漸澆訛，不及純朴，至今應悉爲鬼魅，寧可復得而教化耶？”<sup>4)</sup>可以看出，魏徵從實際出發打破歷來種種習慣性思考，爲現實中實現政治理想尋找具體政治原理，有相當的進步性。貞觀時期君臣之間討論的很多政治問題，如君臣一體、求賢用人、君民如舟與水、鑑戒居安思危、推崇廉潔儉約等都屬於實際性的問題。他們對文學的看法也很實際。不僅文學，爲歷來統治者所重視的音樂也與政治的開明與否聯系，“以政評樂”、“以樂平政”。貞觀初唐太宗與重臣之間有一場關於音樂的討論，較好表示他們對音樂的看法。

太常少卿祖孝孫奏所定新樂。太宗曰：“禮樂之作，是聖人緣物設教，以爲擗節，治政善惡，豈此之由？”御史大夫杜淹對曰：“前代興亡，實由于樂。陳將亡也爲《玉樹後庭花》，齊將亡也爲《伴侶曲》，行路聞之，莫不悲泣，所謂亡國之音。以是觀之，實由于樂。”太宗曰：“不然，夫音聲其能感人？歡者聞之則悅，哀者聽之則悲，悲悅在于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其人心苦，然苦心相感，故聞之則悲耳。何樂聲哀怨，能使悅者悲乎？今《玉樹》、《伴侶》之曲，其聲俱存，朕能爲公奏之，知公必不悲耳。”尚書右丞魏徵進曰：“古人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樂在人和，不由音調。”太宗然之。<sup>5)</sup>

一般認爲，這場討論中唐太宗和魏徵的意見表示對音樂與政治之關係較通達的態度。可是，他們的通達祇不過是強調政治，并不意味着認定音樂的獨立性。遍覽魏徵和唐太宗的文章，找不到類似的音樂獨立性的看法。三個人的意見，都把音樂與音樂以外的東西即政治聯系，大體上一致，祇是角度不同而已。杜淹的看法代表傳統儒家的音樂

3) 《隋書·文學傳序》。

4) 《貞觀政要·政體》。

5) 《貞觀政要·禮樂》。

決定政治說，把音樂推到決定政治的地位。杜淹理解為“音樂→人心→政治”的影響關係，太宗把它調頭過來理解為“政治→人心→音樂”的影響關係。杜淹和太宗的看法表面上相反，而實際上都說音樂與政治的相互影響。接着，魏徵以《論語》孔子之語來概括這場論辨的核心，其主旨仍在音樂的“安上治民”、“移風易俗”<sup>6</sup>)等“人和”方面，不在于“音調”等具體表現上，可以圖為“音樂→人心←政治”。魏徵似乎回避聲有無哀樂問題，又把音樂與政治先後問題的焦點移到音樂的真正實際問題，補充杜淹與太宗的意見偏差。總之，魏徵不一定贊成唐太宗，特別注意在聲無哀樂論會引起的享樂縱欲，所以最後太宗贊同魏徵而這場論辨結束。三個人的意見分歧發生在音樂與政治關係上側重點哪裏。其重點雖然各自不同，但音樂與政治的關係上魏徵的看法最得要領，音樂的最主要功能為治國安民。關於《玉樹後庭花》，《通典》卷一四二：“及後主嗣位，沈荒于酒，視朝之外，多在宴筵。尤重聲樂，遣宮女習北方籥鼓，謂之代北，酒酣則奏之。又于清樂中造《黃鸝留》及《玉樹後庭花》、《金釵兩臂垂》等曲，與幸臣製其歌詞，綺艷相高，極于輕蕩。男女唱和，其音甚哀。”魏徵在《陳書·後主紀》附論說：“古人有言，亡國之主，多有才藝，考之梁陳及隋，信非虛論。然則不崇教義之本，偏向淫麗之文，徒長澆僞之風，无救亂亡之禍矣。”<sup>7</sup>) 在政治得失的範圍裏考慮音樂是當時普遍認識。

魏徵重視的“教義之本”是從文學的政治價值的角度上考慮的，而梁、陳、隋崇尚的“淫麗之文”是從文學的娛樂功能的角度來批評的。所以，魏徵等貞觀君臣以文學的政治價值來否定文學的娛樂功能。這是他們的文學觀的核心內容。本來對齊梁浮靡文風的指責，前代表子野、劉勰、顏之推等已有論述，他們之間

6) 鄭玄與馬融的注。

7) 在音樂與政治的聯系中，最極端的結合是淫聲與亡國之關係。這種想法一直連續到後代史學家。《樂府詩集》卷六一引《宋書·樂志》云：“故蕭齊之將亡也，有《伴侶》；高齊之將亡也，有《無愁》；陳之將亡也，有《玉樹後庭花》；隋之將亡也，有《泛龍舟》。所謂煩手淫聲，爭新怨衰，此又新聲之弊也。”按南齊的《伴侶》，唐太宗說“其聲俱存”，而武則天時清樂四十四曲中不存，武則天時期以前已亡佚。北齊的《無愁》，《隋書·音樂志》云：“北齊後主自能度曲，嘗倚弦而歌，別采新聲，為《無愁曲》。自彈琵琶而唱之，音韻窈窕，極於哀思。使胡兒闍官鞞齊和之，曲終樂闋，莫不隕涕。雖行幸道路，或時馬上奏之，樂往哀來，竟以亡國。”隋代的《泛龍舟》，《隋書·音樂志》曰：“煬帝大制艷篇，辭極淫綺。令樂正白明達造新聲，創《萬歲樂》、《藏鉤樂》、《七夕相逢樂》、《投壺樂》、《舞席同心髻》、《玉女行觴》、《神仙留客》、《擲磚續命》、《鬪鷄子》、《鬪白草》、《泛龍舟》、《還旧宮》、《長樂花》、《十二時》等曲，掩抑摧藏，哀音斷絕。”

多少有意見分歧，但大體上以儒家的正統思想來抨擊齊梁文風是共通的。到了唐初，強調歷來朝代更替的原因歸咎于腐朽政治，引伸到文學藝術的風氣。唐初文學觀與前代最大不同之處在于文學藝術與興亡盛衰聯系，強調文學的政治性。

貞觀政治的基本特征之所以重要，因為文學理論與此密切結緣。對於唐朝的政治文化制度的淵源和文學理論的南北學人的影響，學界已有相當的論述，而唐初國家形成期追求的理想的政治形態，少有言及。唐初，特別在貞觀二十多年時間裏，君臣合力作出“貞觀之治”的功績，其主導思想以儒學為主，但應注意的是君臣并不主張思想本身，而注重于適用於現實的效果來判斷思想和制度，如前邊論述，顯得很實際。閱覽《貞觀政要》，太宗經常以“朕看古來帝王……”、“朕歷觀自古人臣……”的套語開始，群臣也從歷代文物典章中找到合適的意見。而且，貞觀時期帝王的求諫和納諫很特出也表示着他們的這種政策樹立過程。太宗曾經回顧貞觀初建立政策方向時的魏徵的作用：“（太宗）嘗謂長孫无忌曰：朕即位之初，上書者或言‘人主必須威權獨運，不得委任群下’；或欲耀兵振武，懾服四夷。唯有魏徵勸朕‘偃革興文，布德施惠，中國既安，遠人自服。’朕從其語，天下大寧。絕域君長，皆來朝貢，九夷重譯，相望于道。此皆魏徵之力也。”<sup>8)</sup>唐代“文治主義”的發軔，歸功于以魏徵等文臣。魏徵在武德時期“奏引學者校定四部書。數年之間，秘府圖籍，粲然華備。”他本人著述甚豐富，主編《隋書》以外《次禮記》二十卷、《自古諸侯王善惡錄》二卷、《祥瑞錄》十卷、《列女傳略》七卷、《諫事》五卷、《羣書治要》五十卷、《時務策》五卷、《魏徵集》二十卷，還預修《大唐儀禮》一百卷、《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等。其中大多數著作都從具體的歷史中得到政治原理為原則，又這種著述成為“偃革興文，布德施惠”的重要項目之一。

‘以政評文’的文學觀，在創作內容上表現為兩個傾向。一個是勸戒內容的增加，另一個是歌功頌德。貞觀君臣寫了不少涉及政治的詩、賦、銘。“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的文學傳統在這時期恢復，熱心于經國之道的討論經常連續到宴會場面上，《大唐新語》卷八云：

太宗在洛陽宮，幸積翠池，宴群臣，酒酣各賦一事。太宗賦尚書曰：“日昃玩百篇，臨燈

8) 《旧唐書》卷七十一。

披五典。夏康既逸豫，商辛亦流湏。恣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鮮。減身資累惡，成名由積善。”征賦西漢曰：“受降臨軹道，爭長趨鴻門。驅傳涓橋上，觀兵細柳屯。夜宴經柏谷，朝游出杜原。終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太宗曰：“魏徵每言，必約我以禮也。”

《唐詩紀事》也記載同樣的內容，魏徵的創作主旨是因“天下既治，（魏徵）惧帝喜武功，嘗賦詩。”魏徵為勸戒太宗的自滿武功而賦詩，太宗因此以為“約以禮”。太宗本人“好大喜功”<sup>9)</sup>，魏徵對這種夸耀功業“犯顏進諫”。除詩歌以外其他文體也這類內容普遍存在。魏徵《九成宮醴泉銘》諫太宗喜愛峻宇雕牆，李百藥《贊道賦》諫太子承乾耽于逸樂，謝偃《惟皇戒德賦》以申諷，張蘊古《大宝箴》“文義甚美，可為規戒”，都是屬於這類的作品。

### 3. 南北文風結合的嘗試和宏麗文風的唱導

貞觀史臣的以政評文的文學觀念引導新的文學方向。除了勸戒和頌讚內容的增加以外，還有“宏麗”文風的形成。其開端于魏徵和太宗。我認為魏徵不僅提出南北文風的融合，還嘗試過這理論的實踐。魏徵的存世詩歌作品，除雅樂樂章以外儘有五首，<sup>10)</sup>其中他在武德元年歸唐直後自請安輯山東，出潼關時寫的《述懷》，以質朴的語言抒寫出使的經歷和關外景物以及慷慨意氣，屬於“重乎氣質”的作品。貞觀五年寫的《奉和正日臨朝應詔》，極力表現唐帝國元旦朝會的盛況，有昂揚旭日氣勢。貞觀六年寫的《九成宮醴泉銘》，可以說符合于南北文風融合的作品。他運用極其華美的偶句描寫九成宮的外觀和來歷，但始終不忘給太宗的勸戒。“珠壁交映，金碧相輝”的高閣長廊，雖然富麗堂皇，可是“其移山廻澗，窮泰極侈，以人從欲，良足深尤”，“仰觀壯麗，可作鑑于既往；俯察卑儉，足垂訓于後昆。”在銘文的結尾總結九成宮的教訓：“（我后）居崇茅宇，

9) 《新唐書·太宗紀》贊文。

10) 《全唐詩》收錄《五郊樂章》二十首，《享太廟樂章》十一首，《賦西漢》，《暮秋言懷》，《述懷》，《奉和正日臨朝應詔》。《全唐詩拾遺》收《宿沃州山寺》一首，《缺題五古詩》二首。其中《暮秋言懷》，據敦煌殘卷作崔湜，王重民《補全唐詩》補入崔湜名下。

樂不般游，黃屋非貴，天下爲憂；人玩其華，我取其實；還淳反本，代文以質；居高思墜，持滿戒溢。”富麗的詞藻和鏗鏘的音韻炫耀着宮殿和周圍環境，可是其主旨就在于鑑戒這種極度的奢華。如果把華麗的文章看作可以訓戒的對象，這裏存在着矛盾，即以華麗的語言來批判奢侈的宮殿。他以內容和形式的矛盾結合在一起充分發揮既“便于時用”，又“宜于咏歌”的文章。但是，魏徵畢竟是素有“落拓有大志”的政治家，他的主要精力不專用于文學創作上，因此不能說他的理論完全實現在他的作品上。這種文風最多運用的作家就是太宗。他的代表作《帝京篇》最好表現這個特色。這組詩從早晨到夜晚的時間推移寫觀閣、典籍(文)、游獵(武)、音樂、園林、川游、夜景、宴樂等皇帝的生活和環境。其一：

秦川雄帝宅，函谷壯皇居。結殿千尋起，離宮百雉余。連薨遙接漢，飛觀迫凌虛。雲日隱層闕，風烟出結疏。

讀這首詩時然發生一個疑問。爲什麼他以“藻瞻精華”的詞藻修飾《序》裏批判的“峻宇雕牆”？換句話說，太宗在《帝京篇序》裏反復明白地說，“漢武魏明，峻宇雕牆，窮侈極麗……覆亡顛沛，不亦宜乎！……臺榭取其避燥濕，金石尚其諸神人，皆節之于中和，不系之于淫放。……麟閣可玩，何必兩陵之間乎！……釋實求華，以從人欲，亂于大道，君子耻之”，但是詩篇正好寫的是他所批判的觀閣的壯觀和雄偉，與《序》自相矛盾，這如何解釋？我認爲，其答案在于這組詩的最後一篇，其十云：

建章歡賞夕，二八盡妖妍。羅綺昭陽殿，芬芳玳瑁筵。佩移星正動，扇掩月初圓。无勞上懸圃，即此對神仙。以茲游觀極，悠然獨長想。披卷覽前踪，撫躬尋既往。望古茅茨約，瞻今蘭殿廣。人道郡高危，虛心戒盈蕩。奉天竭誠敬，臨民思惠養。納善察忠諫，明科慎刑賞。六五誠難繼，四三非易仰。廣待淳化敷，方嗣云亭響。

到了最後的這首，才知道，前邊描寫的富麗堂皇的皇城是這首詩的後半部的反襯，爲強調“望古茅茨約，瞻今蘭殿廣，人道郡高危，虛心戒盈蕩”的道理而設置的。正好與魏徵的《九成宮醴泉銘》一樣，這種手法充足兩個要求：一個是充分發揮皇家的氣派，另一個是不忘插入勸戒。這類作品在太宗之作中相當多，如《出獵》、《冬狩》、《初春登樓即日觀作述懷》、《賦得含峰雲》、《三層閣上置音聲》等。從

貞觀初期，許敬宗參與寫宮廷應制詩隊伍，極力發揮這方面的文風。這些作品雖局限于宮廷文學範圍，但開了一個新的文學指向，即宏麗文風。貞觀後期太宗概括陸机的詩文說，“文藻宏麗，言論慷慨”，乃是表現自己文風的追求。《舊唐書·太宗紀》云“(太宗)天才宏麗，興託玄遠”，摘出太宗詩文的重要特征。這種宏麗文風無疑是初盛唐文風的重要特征之一。

#### 4. 宮廷詩的進展和有時代特色的文學

貞觀詩壇以宮廷詩為主流，其題材主要涉及賜宴、巡幸、歲時、臨朝、咏物等。除此之外描寫群臣文會場面較有時代特色。貞觀時期大規模宴集有兩次，其中之一關於安德郡公楊師道家裏。《全唐詩》保存岑文本、李百藥、劉洎、褚遂良、楊績、許敬宗、上官儀等七人的同題作品《安德山池宴集》。據《舊唐書·楊師道傳》，貞觀十三年楊師道奉安德郡公，詩作當于貞觀十三年到十八年之間。<sup>11)</sup> 楊師道宅位于長安長興坊，“地至閑僻”，占地頗廣。<sup>12)</sup> “春晚花方落”的美好時節，重臣們在“密樹風烟續，迴塘荷芰新”的自然環境和“亭中奏趙瑟，席上舞燕裾”的氣氛中抒發愉悅的心情。我們與《藝文類聚·水部·池》所載的梁簡文帝、庾肩吾、王臺卿、鮑至、徐陵的《山池》比較，不難發現兩者之間的差別。梁代的滿篇景語明顯追求形似之妙的心理，到了唐初重臣的詩篇裏轉換為注重于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的交融以及人際關係的和悅。這是因為時代的秀圍氣、園林玩賞方式、詩歌創作心理不同而產生的。

宮庭文學也有創作上的貢獻和指導。如前邊論述，貞觀文學走向氣勢宏偉的方向，一方面給一些文人加以精練的機會。宮庭文學是以宮廷生活為主要對象的文學，內容多

11) 詩作者中岑文本最早卒于貞觀十九年(645年)幽州軍中。詩作不晚于他貞觀十八年(644年)十二月出征時期。

12) 長興坊乃長安朱雀門街第一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三坊，《長安志》云，唐會昌五年詔皇城六坊內不得置私廟，而中書門下奏長興坊，俗稱園外，地至閑僻，於此置廟，无所妨礙。從之。又《長安志》云：“東北隅侍中駙馬都尉楊師道宅。”注：“其地後分裂，左監門大將軍韓琦，尚書刑部侍郎崔玄童，荊府司馬崔光意等居。”可知其占地相當廣。

歌功頌德，點綴王業，講究技巧工整，結構忌變化，要求一定的時宜性。這種文學創作環境有時有助於文人創作的提高。這裏以許敬宗為中心論述，從他的作品裏有四首有關七夕的詩篇來看，這個變化相當明顯。

一年抱怨嗟長別，七夕含態始言歸。飄飄羅袂光天步，灼灼新妝鑑月輝。情催巧笑開星鬢，不惜呈露解雲衣。所歡却隨更漏盡，掩泣還弄昨宵机。（《七夕賦咏成篇》）

一年啣別怨，七夕始言歸。破涕開星鬢，微步動雲衣。天迴兔漸落，河曠鵲停飛。那堪盡今夜，復往弄殘机。（《五言七夕侍宴賦得歸衣飛机一首應詔》）

婺閩閨今夕，娥輪泛淺潢。迎秋伴暮雨，待暎合神光。荐寢低雲鬢，呈態解霓裳。喜中愁漏促，別後怨天長。（《奉和七夕宴懸圃應制·其二》）

《七夕賦咏成篇》，同題賦咏的詩人還有凌敬，沈叔安，何仲宣。其寫作至遲不得晚于太宗貞觀年間。<sup>13)</sup> 據他們活動的時間，更具體地說，可能寫于貞觀初期。《五言七夕侍宴賦得歸衣飛机一首應詔》，載于《翰林學士集》以大多數詩作于貞觀後期，<sup>14)</sup> 這首詩也很可能寫于貞觀後期。《奉和七夕宴懸圃應制》二首，高宗有同題同韻二首，可能作于高宗即位永徽以後。現存貞觀時期詩作中，太宗以外許敬宗的作品最多，尤其文會中寫的有六首。上面舉例的三首中七言詩最先寫的。其後宮廷應制中兩次把它改作為五言，詩歌的意境相差不多，但七言的自然朴素的語言風格變成講究細琢精巧，更追求作品的精練。第三首更講究造語，“婺閩”、“娥輪”、“神光”、“荐寢”、“呈態”等詞彙可以細工，逐漸脫離人間的自然氣息，接近于神仙意境。把一個主題反復吟咏中終於得到適合于宮廷詩的作品，這是宮廷詩給一個寫作引導背景。許敬宗可以說是典型的宮廷詩人，《文苑英華》多收錄他的應制詩。他的詩，章法易顯鋪張，詞藻多引賦銘中的語句，貞觀宮廷詩中獨樹一幟，增加了宮廷詩的新的面貌。

貞觀史臣的理論對後發之秀的上官儀、謝偃等的約束性相對而言較輕。他們的文風

13) 趙昌平《初唐七律的成熟及其風格溯源》。《趙昌平自選集》所收，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14) 《翰林學士集》裏不能確定的詩篇有兩題，即《五言七夕侍宴賦得歸衣飛机一首應詔》和《五言侍宴沙欄宮賦得情一首應詔》。可以斷定的詩中，除了《四言曲池醜飲座銘》作于貞觀四年以外，其它都作于貞觀十五年到貞觀二十二年之間。參考陶敏、傅璇琮，《隋唐五代文學編年史》，遼海出版社，1998年版。

較婉弱，抒情性強，接近于南朝文風。他們的作品得到太宗的賞讚，南朝文風繼續連續下去的重要原因之一。這說明史臣的理論不能涵蓋整個宮廷詩壇。我們看上官儀的初期詩《早春桂林殿應詔》與後期詩《入朝洛堤步月》沒有風格上的變化，其實一直維持以綺錯婉媚為主的詩風。他繼承謝朓體的精髓，對六朝聲辭作洗汰取舍，并進而自鑄新詞，自成體段。<sup>15)</sup> 他們的作品從南朝文風中成長而脫離南朝浮靡文風，是唐初詩壇上可貴的經驗。

## 5. 折衷主義文學觀的承襲和綺靡文風與綺艷文風的交叉

貞觀君臣一方面反對基于腐朽政治的“輕華”、“淫麗”文風，另一方面強調文學的政教得失功能。但他們并不祇局限于“時用”文章，“清辭雅致，風流文雅”也肯定。貞觀君臣考慮文學的藝術價值時，一般從兩個角度來看文學現象：一個是以詞采、音調、文義等文學作品構成要素論文學作品；另一個是以文風的角度論述文學現象。魏徵等吸收南北朝文學的長處，并且對“縟彩”、“逸響”都高度肯定，給歷代多數作家合理的評價，而且文學本身的藝術價值也相當肯定：

愛逮晉氏，見稱潘、陸，并黼藻相輝，宮商間起，清辭潤乎金石，精義薄乎雲天。……宋、齊之世，下逮梁初，靈運高致之奇，延年錯綜之美，謝玄暉之藻麗，沈休文之富溢，輝煥炳蔚，辭義可觀。（《隋書·經籍志》）

和而能壯，麗而能典。（《周書》史論）

緣情極綺靡之能，體物窮瀏亮之趣。（令狐德棻《大唐故柱國燕國公于（志寧）君碑銘》）

這時期文學觀念大體繼承前代文學理論，其中陸机、沈約、劉勰、蕭統的影響頗明顯，可以說是齊梁折衷主義的後身。不僅如此，貞觀時期詔書也屢發征求“文詞秀美，才堪著述”，“鴻筆麗藻”的人才。當時相當着重文詞的華美和音韻的鏗鏘。孔穎達這

15) 趙昌平《上官儀及其歷史承擔》。《趙昌平自選集》所收，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樣“更廣規諷之道”的大儒，其“詞光翰苑，文麗采虹”，“《釋奠頌》一篇，文艷雕龍，將五色而比彩；韻諧□鳳，與八音而同節。逸思掩于子玉，麗藻超于□□”<sup>16)</sup>；蓋文達這樣“有士君子之風”的儒士，其文“縵藻麗于雕龍”<sup>17)</sup>，法琳這樣高僧也“既善緣情，尤工體物，篇章婉麗，理致逾華，郁陶間綺錦之文，飄飄凌雲之氣”，<sup>18)</sup>“典而不野，麗而有則；猶八音之并奏，等五色以相宣。”<sup>19)</sup>對文學形式普遍肯定。

魏徵還注意到南北文風的長處和其融合。這時期南北朝文化的彙集也急需的工作。南北朝長期分隔，經過魏孝文帝漢化政策、戰爭和使臣的往來等的途徑來部分互相影響，在侯景之亂以後逐漸打破對峙狀態，隋文帝統一南北更促進文化上的交流。魏徵從短暫的隋朝和唐帝國的再統一的背景上省視南北之間的文化差異和融合，提出理想的文學：“江左宮商發越，貴于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辭，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于時用，文華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掇彼清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彬彬，盡善盡美矣。”<sup>20)</sup>這裏所說的清綺指的是清暢綺麗的詩文風格；氣質指的是由人的剛柔性情流露于文章的風格。歷來文學中偏于一方面的文學相當多，如“魏文之才，清綺洋洋”(《文心雕龍·才略》)；“(潘)岳爲文，選言簡章，清綺絕倫。”(《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引《續文章志》)；“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宋書·謝靈運傳論》)等等。兩者之中一方面是不够的，兩者的統一才達到盡善盡美的境界了。令狐德棻也說類似的看法，各種文體“撮其指要，舉其大抵，莫若以氣爲主，以文傳意。……其調也尚遠，其旨也尚深，其理也貴當，其辭也欲巧。然後瑩金壁，播蘭芝，文質因其宜，繁約適其變。權衡輕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壯，麗而能典，煥乎若五色之成章，紛乎猶八音之繁會。”<sup>21)</sup>文中的“以氣爲主”相當于魏徵的“重乎氣質”，“和而能壯，麗而能典”相當于蕭統的“麗而不浮，典而不野”的標準。可以看出南北文風結合論是折衷主義理論的翻本，祇不過是唐初人

16) 《全唐文》卷一四五，于志寧《大唐故太子右庶子銀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憲公孔公碑銘》。

17) 《全唐文》卷一四五，于志寧《唐太傅蓋公墓碑》。

18) 《全唐文》卷一三四，陳子良《辯正論注序》。

19) 《全唐文》卷一三八，虞世南《破邪論序》。

20) 《隋書·文學傳序》。

21) 《周書·王褒庾信傳論》。

更明確地說而已。

貞觀君臣既然着重政治得失，其結果在文學審美價值方面不得不與前代理論有一些變化。對這些問題他們沒有直接論述，導致文學理論包含着理論本身的缺陷。具體的說，其一，文學評價根據的不一致。史臣們一方面批評梁陳文學，運用政治得失的原則；另一方面肯定蕭齊以前的作家，使用審美價值為判斷准據。這種文學評價基準的不一致，會導致文學觀念的混亂和創作的萎縮。魏徵以梁大同年間為划分文道興衰的分水嶺，其意在于蕭統《文選》的成書和其文學思想有關。梁中大通年間，折衷主義的文學理論家裴子野和蕭統相繼去世。稍前劉勰已去世的情況下，高談文學之道的論客減迹，文風競逐頹靡，國勢日益衰弱。唐初史臣繼承折衷主義理論，反而大梁中期以後的文學一概否定，難免論調過分。其二，歷代文學的認識上缺乏系統性，沒舉出益于自己時代的典范作家。貞觀史臣論述蕭齊以前文學的時候主要以詞采、音調、文義等方面去評價，舉例各時代的文學大師，但少有整個文學大家作為系統性的把握。他們給前代大作家一定的評價和敬仰，引沈約的三變說，可是還沒有舉出對唐初人來說最具有引導性的作家。鍾嶸《詩品》裏明確指出“上品”詩人和其詩歌來源和特征，其理論觀點鮮明。唐初史臣沒有舉出他們所指向的“典范”作家，這表示他們在文學觀念上仍然處於探索階段。標舉典范作家，從貞觀後期開始闡述。他們經常用“文宗”的概念來表示大作家。看太宗撰《晉書·陸機傳論》云，“百代文宗，一人而已”，又《晉書·張載傳》史臣論云：“當代之文宗”，陸机的文學上地位極高，與其它作家加以層次。《晉書·文苑傳序》云：“逮乎當涂基命，文宗郁起，三祖協其高韻，七子分其麗則，翰林總其菁華，典論詳其藻綯，彬蔚之美，競爽當年。獨彼陳王，思風過舉，備乎典奧，懸諸日月”也三曹七子與曹植之間加以層次而標舉曹植。貞觀後期成立“文宗”的概念有助于當時人掌握文學創作道路，給他們引導時代文風的方向。武則天時期，京兆司功王適看《感遇詩》三十首目陳子昂曰：“此子必為天下文宗矣！”<sup>22)</sup>五史裏雖舉大作家以及其風格和特點，但難免平面羅列，先後主從不太分明。其三，綺艷文風和綺靡文風的難分。史臣主張的“亡國之音”帶着一種反面教訓，不讓作家去寫艷詩，同時給梁陳文學戴“淫放”、“浮艷”的帽子，連其優秀的文學成就也否定。但是，這與他們所

22) 《旧唐書·陳子昂傳》。

稱讚的“藻麗”、“富溢”文風有時很難區分開來。換個話說，從詞藻的華美和音律的鏗鏘等文學形式的角度看，宋齊文學和梁陳文學之間有不可分的連鎖關係，尤其沈約和謝朓的文學與梁陳文學一脈相承，如果肯定謝朓，不容易否定徐庾。還有一點，由于評價蕭齊以前的作品時不採取政治得失的觀點，這會引起蕭齊之前歷史和文學的聯系稍有松弛，回頭看唐人自己時代的政治和文學時會產生祇有不寫艷詩就無得罪的觀念。關鍵在于文學不違背“典則”的標準。“典則”的標準在哪裏，這本來是很難確定的問題，隨着時代的變化和統治者的要求而變化的。換個角度來說，他們批評娛樂功能的浮靡文風和藝術價值的綺靡文風也有時難以區別。他們的區別根據有兩個：一個是政治環境，另一個是艷體。可是，綺靡和浮艷之間仍然相差不多。

唐初貞觀史臣的創作上他們所肯定的上乘之作實際文壇上很少出現。這裏有相當的原因，如果從具體作家去尋找其原因，可以發現理論的提出對每個作家影響不同，而且文風的轉變與理論闡述之間有一定的距離，文風不一定那麼容易短期間內變化。文學創作的環境因素複雜，有時代風氣和个人嗜好之間的差異，也有感受和表現之間的距離。文學理論往往引導準確的方向有利于作家，也有時阻礙或干撓个人自發的創作途徑，特別唐初這樣時代要求較強的時代更是這樣。唐初相當多的作家都受到這種“開拓”和“約束”之間的緊張，各自尋求出路。魏徵，王圭的質朴沉健，他們對這種風格素有嗜好，比如魏徵《述懷》是提出理論之前寫的。而隋唐之際多少作家都面臨着自己習慣的梁陳之風如何處理。很少文人找出創作的出路。這裏舉幾個作家。虞世南“善屬文，常祖述徐陵，陵亦言世南得己之意。”（《舊唐書·虞世南傳》）虞世南可以說是一個文人，他的創作源于徐陵，在隋代“與當時辭人蔡君和、孔德紹、庾抱、庾自直、劉斌、劉孝孫等登臨山水，結為文會。”（《舊唐書》）《北堂書鈔》也隋代任秘書丞時編撰的。武德四年竇建德敗，虞世南歸唐，為秦府參軍，時六十四歲。在唐朝，他與魏徵一樣主要擔任太宗的顧問，因為他“學綜古今，行篤終始，至孝忠直，事多宏益。”（《唐會要》卷八十）但入唐以後沒有突出的文學成果。他的《從軍行》等一些樂府題詩歌，時有剛健遒勁之氣，而因這種文風接近于隋代薛道衡和楊素，在不能確定寫作時期的情況下不能說入唐後的詩歌創作。李百藥“七歲解屬文”，熟知徐陵文章典故，“藻思沈郁，尤長于五言詩，雖樵童牧豎，並皆吟諷。”（《舊唐書·本傳》）而現存詩作，以應制奉和詩居多，其中優秀的詩篇，如《郢城懷古》《秋晚登古城》等寫于隋

唐之際。《妾薄命》和《火鳳詞》二首，是典型的艷詩。他的作品，大體說咏懷言志的詩篇和應制浮艷混在一起，與《北齊書》的批判“輕險”文風不相稱。楊師道“雅善篇什”，“太宗每見師道所制，必吟諷嗟賞之”，又“師道退朝後，必引當時英俊，宴集園池”（《旧唐書》卷六二），“分庭接游士，虛館待時英”（李百藥《寄楊公》）其存世作品，應制咏物詩多，頗有南朝之風。他們的作品裏多种風格的混在，是隋代的特點。一个詩人可以多种樂府題來嘗試各种風格的詩歌，既然如此那麼不能沒有共通的作家創作个性。隋代到唐初，一些作家寫過多种風格的詩歌而少有作家个性，這表明他們寫詩賴了文學性習慣，還不足文學創作的自覺性和積極性。

## 6. 結 論

唐初開國時期的文學理論，主要以史論的形式表現，既是對前代文學經驗的總結，又是後來唐詩的良好開端。其文壇上的主要貢獻，首先，全面清理省視前代文學。他們文學理論具有較強的政教得失功能，給當時人沙汰六朝浮靡文風而找出新的文學內容和形式。唐初三十年的文壇已經與隋代過度狀態的文風不同，開始確立自己的特點，這是唐代文學發展上不可底估的功績。其次，新的文學指向出現。太宗和魏徵等一些重臣把他們的文學理論主張適用於實際創作實踐。他們的文學逐漸形成宏麗文風，以後四杰手裏得到更發揚。再次，頌美諷刺傳統的復活。文學作品中多涉及政治問題也與這時期文學理論有關。

在另一方面，君臣把政治得失推到所有價值上面，重臣反復追求殷鑑不遠的前代教訓，太宗也屢次推闡為政之要的治國原則。武德貞觀這樣特殊的時期，他們提出的理論本身具有時代局限性，引起了文學觀念和實際創作上混亂。一个原則容易變成不可觸犯的金科玉條，與此相對的東西容易變成禁忌的對象。虞世南、李百藥、楊師道等跨隋唐之際的詩人的創作入唐後不太振作。唐初三十年期間，大作家沒出現，鮮明的共通文學傾向也還沒成熟，這樣，唐初詩壇正在多樣的詩風混在一起的時期。唐初詩壇雖然齊梁詩風的影響還深，但是唐詩自身的面貌也不能沒有。統一國家的成立、開明政治的施

行、門閥傳統的衰弱、科舉制度的逐漸擴大等等，與前代時期不同的環境給文化承擔者很好的條件，其創作也畢竟會帶有新的時代面貌。就詩歌方面而言，前代所有文風伴隨詩人的種種對文學的態度和個人處境而表現得多樣化。到了貞觀後期，詩壇逐漸脫離史臣理論的約束而終結理論應負的使命。

< 參考文獻 >

- [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中華書局,1992.)  
[宋]郭茂倩編撰,《樂府詩集》,(中華書局,1991.)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中華書局,1996.)  
[唐]令狐德芬撰,《周書》,(中華書局,1995.)  
[唐]魏徵等撰,《隋書》,(中華書局,1982.)  
[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中華書局,1997.)  
[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中華書局,1997.)  
[唐]吳兢撰,《貞觀政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唐]歐陽詢撰,《藝文類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趙昌平,《趙昌平自選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陶敏·傅璇琮,《隋唐五代文學編年史》,(遼海出版社,1998.)

## &lt; 국문요약 &gt;

唐의 건국 초기인 武德·貞觀 연간의 30년 문학은 唐의 새로운 문학환경의 출발점이다. 실제 창작에서는 齊梁陳 시기의 綺靡한 문풍이 지속되면서도, 문학사상에서는 前代의 문학을 淫麗 혹은 浮艷하다고 비판하였다. 이러한 모순 속에 문학현상은 다양하고 복잡하게 전개되었지만, 결국 頌美諷刺 위주의 政教 특질을 목적으로 하는 전통 문학관이 건립되었다.

貞觀 문단은 前代까지 발전해온 문학을 총괄하고, 새로운 문학의 내용과 형식을 찾고, 남북조 문학의 장점을 융합하려 했으며, 唐太宗과 魏徵 등은 宏麗한 문풍을 창안하여 四傑에게 물려주었다는 점 등에서 큰 의의가 있다. 그러나 정치적 입장이 문단의 전면에 들어서고, 前代에 대한 비판도 체계적인 이론에 의해서가 아니라 정치적 평가의 연장으로 이루어졌고, 뛰어난 작가가 출현하지 않았으며, 문단을 주도하는 뚜렷한 문학사조가 형성되지 않았다는 점에서 한계를 가지고 있었다.

魏徵·虞世南·李百藥·楊師道 등 건국의 공신들이 주축을 이룬 정관 문단에서 일단 전통 문학사상이 확립되자 이것이 문학의 자발성을 위축하지 않게 하는 새로운 문학관념과 실천이 필요하게 되었다. 이러한 후속적인 변화는 당장에 오지 않았고, 정관 연간 후기부터 두드러지게 활동하기 시작한 許敬宗·上官儀·謝偃 등과 總章 연간 이후 市井에서 활동하던 四傑, 그리고 武后집권기의 문인들을 통하여 이루어져나갔다. 정관 문단은 唐代문학의 발전에 필요한 새로운 기틀을 정치적 환경 속에서 건립했다는 점에서 전통 詩教의 환경 속에 있지만, 六朝의 풍부한 문학전통을 가지고 출발했다는 점에서 절충주의 문학관이 들어서게 되었다.

關鍵詞：綺靡, 雅音, 以政評文, 宏麗, 南北文風結合, 宮廷詩, 折衷主義文學觀.